

财金泰斗王传纶

○李扬 瞿强

王传纶（1922—2012），江苏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金融与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1922年4月，王传纶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曹家巷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他自幼好学，品学兼优。高二时淞沪战起，学业时续时断。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王传纶全家被迫逃往上海以避战祸。1938年，王传纶在租界的中学继续高三课程。

当时，正值北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并委托暨南大学代为招生。王传纶当时高中尚未毕业，只能以同等学力投考，因诸科成绩优秀，遂被录取。该年秋，他自上海出发，历经辗转，最终到达昆明，成为联大第一届学生，时年16岁。

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大宛如严寒中的梅花，是中外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偏居边陲，存亡未定，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据王传纶回忆，很多教师甚至要靠卖旧家当维系生活，很多学生则是靠课余打零工来完成学业，就连校长梅贻琦夫人都需要时常

烤卖小点心补贴家用。但是，联大的精神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在为国家和民族“保留文脉”的使命感召下，学校的系科设计，既承续了三校注重通识教育的传统，又体现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因此，王传纶在那里，受到了当世最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初入联大时，王传纶读的是文学院的哲学心理学系。一年级结束时，他兴趣转移，遂申请转入经济系。经济系归属法商学院，教师以陈岱孙为首，大部分留学英美。该系培养理念虽也强调学生“于我国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但课程设置却几乎全部复制英美，很多课程更直接使用英文教材，教师授课也是中英文杂糅。

在西南联大的四年中，尽管物质条件菲薄，日寇的敌机还时常骚扰，王传纶的生活却是充实的。他不太关心政治，只是徜徉于书海，潜心于学问，学习成绩优异。



王传纶教授（中）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 人物剪影



2002年,五位联大同学相聚北大。左起:朱光亚、许渊冲、杨振宁、王传纶、王希季

王传纶主修陈岱孙先生的招牌课“经济学概论”,陈先生讲授的是当时先进的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源自英美的经济历史与现实。然而,置身于当时的经济环境,王传纶朦胧地觉得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学问,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隔阂。一方面是书本上美妙的“均衡”,另一方面则是国民政府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的“不均衡”。王传纶与当时多数青年学子一样,对自由市场经济感到困惑。其实,有这种困惑的岂止青年学子,20世纪40年代昆明和北京的报刊上,经济学教授的文章中,普遍表达了对当时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加强对市场、商业的管制。这种主流的社会经济思潮,与主流的经济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经济理论的新旧思想同时充斥。那时的西南联大,除了有号称“中国的马歇尔”的赵迺抃教授,还有堪称国际一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徐毓柵教授。新旧思想同堂辩诘,受益最大的当然是青年学子。值得一提的是徐毓柵教授,他曾是陈岱孙在清华的高足,

后被举荐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的那些年里,徐毓柵不仅亲历“凯恩斯革命”,而且参与了这一新理论框架的某些细节的完善工作。由他主讲宏观经济学,当然是一时之选。陈岱孙教授对王传纶青眼有加,三年级结束时,他就亲自指点王传纶要多向年青教师徐毓柵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使得王传纶学业大进。课堂之外,年青的徐毓柵教授更与王传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乃至将自己珍藏的凯恩斯《通论》第一版原著慷慨赠与。惜乎该书在“文革”中遗失,每念及此,王传纶都唏嘘不已。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际经济学界掀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论战”,西南联大自然得风气之先。根据兰格(O.Langer)与勒纳(A.Lerner)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关当局遵照市场原理来定价,资源配置是可以优化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对于处在迷茫中的中国经济学人,所有这些新思想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王传纶热心地向他的学生们指出:30年代,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固然普遍服膺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却也曾普遍被计划经济的想法打动过;自由放任主义,其实并非那一代人的主导思想。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不反感的。

1941年,年方20岁的王传纶从西南联大毕业,他很快就与当时的“校花”、数学系高材生张景昭女士喜结连理,并一同到贵阳的清华中学教书。这所中学的创办人周诒春先生曾任清华学校校长,对于王传纶夫妇自然欢迎。在那里,二人度过了

一生最安定的几年。

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同庆，王传纶也从贵州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同家人团聚。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在读期间各项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两年后，王传纶顺利通过由陈岱孙主持，清华北大的名教授如赵迺抟、蒋硕杰、戴世光、徐毓枏等组成的考官委员会的考试，并得到陈岱孙与徐毓枏的力荐，于1948年底取得了英国半政府组织的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准备赴英国留学。

经前辈建议，王传纶选择了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深造。该校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任教而享有盛名，且对苏联经济研究领域又独有特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他不仅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接触到当时苏联的一些负面信息，如政治高压、肃反、个人崇拜和浮夸风等。对这些事情的体悟，对于他几年后回国，并在国内度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提前给予了警示。

大约1951年年初，有一个新中国文化知识界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留英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的王传纶直接参与了接待工作。代表团中有些人，例如副团长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以前就是王传纶在联大时的老师，与陈岱孙先生也是多年挚友，异国相见，自然格外亲切。王传纶向他们表达了早日回国工作的意愿，并委托周培源教授带了一本斯威齐的新书转交陈岱孙先生，同时也向陈先生表达了归国工作的意愿。不久，陈先生来信，邀请王传纶直接回清华任教，并嘱咐不要经过教育



王传纶研究生毕业照

部分配。这种安排，在当时是承担了不小的政治风险的。

1951年秋，王传纶回到清华。长途劳顿未消，便被派往武汉、广西等地，与先期前往的清华教师汇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约五个月后，接着再去广西桂县参加第二期土改。等1952年回到北京时，清华大学的经济系已经不复存在。此时正值中央政府进行第一次院系大调整，根据安排，清华大学经济系被撤销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陈岱孙任院长。一年后，学院再次调整，部分教师并入北大，部分打散并入其他院校，王传纶则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这时期世事纷繁，如过眼烟云，但有一件事值得记载：陈岱孙先生主事北大后不久，曾写信给王传纶，说自己以后拟不讲授财政学了，希望王传纶做好接班准备。就这样，从1953年开始，王传纶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其长达60年的财政与金融的教学研究工作。

从50年代初回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充满了动荡。王传纶教授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不得不随风起舞之时，守住一份赤子之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教学

□ 人物剪影

与研究工作。他在系统讲授财政学课程的同时，与人大财金系的同仁一道，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在教学科研同时，王传纶教授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调适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与新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相符；同时，尽己所能，译介了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为我国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建设贡献力量。由于刻意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加之天性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王传纶教授有惊无险地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历了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经历了人民大学停办与复校，其本人却基本上未受重大冲击。

但是，就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王传纶教授的家庭生活经历了一次重大波折。196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的夫人，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辱，于系办公楼自杀身亡。1970年，王传纶教授与路奇女士组建了新的家庭。路奇女士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我国著名的矿冶工程师。她曾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1947年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文艺工作，她曾是华北人民文艺团乐队的大提琴手。解放后长期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文章操行俱佳。从那之后，她伴王传纶教授左右，凡四十年，为王传纶教授安心从事教学科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温馨环境。

三

1976年秋季以后，劫后余生的学者们陆续返回校园。当时人民大学正准备复校，百废待兴。在最初的几年，王传纶教授应邀到中国银行从事研究工作，整理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业务资料，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更为中国银行培养了一支年青的研究队伍，为此后著名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成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几乎同时期，他还参加了中央党校一些党政领导举办的“外国外资问题”专题研究小组，译介并整理了大量外文资料。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后，针对引进外资中的涉外税务问题，财政部在1979年冬举办了中国首届涉外税收培训班，但因理论过于陌生而陷入困境。王传纶教授应邀前来“救火”：在资料翻译、亲自授课、观点总结的同时，他积极沟通，为中外双方都解决了诸多困惑，协助完成了中国国际税收界的一次启蒙教育。

198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工作基本完毕，中国银行虽极力挽留，王传纶教授仍决意回到学校的三尺讲台。他如恩师陈岱孙一样，视大学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方净土，决意在大学校园里潜心研究，教书育人。

王传纶教授是中国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财政学的创始人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金融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外汇、汇率和外资等紧迫的国际金融问题，兼及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以及宏观调控等有关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问题。1982年，他撰写了著名的《汇价理论的探讨》一文，首次系统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汇率理论，全面评述了西方主流汇率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美联储当时采用的理论模型的缺陷，指出该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据此，他主张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应当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进一步把汇率调整问题同国内价格政策、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察。另外，王传纶教授一贯主张大力引进外资，同时也

强调必须与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相协调，必须以追求国际收支长期动态平衡为原则。长期以来，他跟踪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问题，针对银行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制度建立等涉及面极广的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一个关于金融体系整体改革的分析框架。这些论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在学术界和决策层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以数十年学术实践之贡献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财税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王传纶教授均建树颇多。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便翻译出版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英美财政》一书，希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借鉴。1981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理论、政策的专著，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也颇多精辟论述。此后，王传纶教授又相继发表了《外国财政问题》《政府预算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和效益核算问题》等大量论文，继续借鉴国外经验，探讨中国财政改革问题。1995年出版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合著）一书，更是将关于不同经济形态国家财政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外，作为我国财金领域的大师，王传纶教授还非常重视对财政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并出版专著多部。

六十年来，王传纶教授不离三尺讲



1993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王传纶教授（左3）与恩师陈岱孙教授（左4）等合影

台，始终坚守在我国财政金融教育事业的第一线。由他主编的教材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材省部级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个人也先后获得“吴玉章基金教学奖”“宝钢教育基金奖”“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励。

王传纶教授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们都走上了我国财政金融管理、实务、研究和教学的岗位，成为中坚和骨干。他的弟子中，先后有两人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在中国学界和教育界，恐怕算是绝无仅有了。

“长于精思又重于实践”是王传纶教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长期致力于将经济理论应用于金融改革与发展实践，不遗余力为新中国金融规划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

作者李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瞿强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